

老年文存

作者：王占连
责任编辑：张冬辉



序 言

痴迷写作 情注故里

徐兴信

王占连，中学历史教师。他以一张生动的脸面对学生，用响亮的膛音上课，把丰富的历史知识传授给一批批家乡学子，桃李满天下。教学之余，离休之后，笔耕不辍，写长短文章数十万字。他用通俗的文字，介绍家乡历史人文，论述历史事件和人物，载存于众多报刊杂志。占连老师不愧为乐亭文化园地的辛勤园丁。

占连老师把写作当嗜好，痴迷其中。耄耋之年，仍然天天思索造篇结字，经常往县文联、县广播电视台、乐亭文化研究会等单位送稿，给报刊杂志投稿。生病卧床笔不停，迈不动步稿转送。王老师在忘我的写作乐趣中，众人在被感动中。

占连老师熟悉家乡，热爱家乡。在他看来，家乡就是自己的骄傲，写乐亭的历史、文化教育、风土人情、名人轶事等，就是自己对故乡感情的表

达。因此，他信手拈来就能写家乡事，调查、搜集述古今。在观察、感触中写好文章。许多事情对别人来说或许一听而过，但对王老师来说，却往往是一个难得的素材。

把乐亭人的历史写出来，不仅仅是历史的人，还还原为人的历史，这是我们治史的最高境界。司马迁实录写《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被占连老师尊崇。王老师在对自己写乐亭历史人文的文章进行整理完善的基础上，选编汇成《老年文存》，分英烈传、伟人风范、历代人物、文化教育等，共70篇文章。文集的出版，为乐亭文化园地添色，占连老师多年飘泊的灵魂也有了寄居所。

向占连老师表示敬贺！

2007年10月27日

目 录

第一单元 伟人风范

孙中山的三位贤内助·····	1
孙中山两进唐山·····	5
毛泽东与中国历史学家的交往·····	6
革命先驱李大钊·····	10
李大钊与冯玉祥·····	11
李大钊与宁绍先·····	15
平腔梆子戏的关注者·····	17
开现代皮影戏之先河·····	21
李大钊送我上小学·····	25
李兆瑞珍藏整理烈士遗文·····	26
李大钊与“评剧”·····	31
李大钊为《枫桥夜泊》书写诗碑·····	32
李大钊反军阀斗争的策略思想及其运用·····	33

第二单元 英烈传

英雄王成的原型——赵先有·····	39
白云龙·····	40
张更时·····	42
李镇·····	44

刘胡兰式烈士吴殿杰·····	45
抗日猛将翟文彬·····	48
黄骅县命名由来·····	50
女侠施剑翘刺杀孙传芳·····	52
北京有个“文公祠”·····	55

第三单元 历代人物

葛养泉和葛东桥·····	57
晚清二品高官——呼震二把手·····	60
李兰和李广滋·····	62
饒首庄张门三科举·····	63
张半仙与张仙祠·····	65
乐亭的皮影剧作家·····	66
乐亭画家邵丹泉·····	68
葛庄有位“文老先生”·····	69
永平知府——贤官游智开·····	71
晚清石各庄刘家名人·····	72
方志学家韩湘亭·····	74
王滩名人·····	76
邓洁民创办东华学校·····	79
路南一区队三连连长刘守仁·····	82
路南一区队老二连连长张子川·····	86

县农会会长王致和·····	89
马祝三教子成才·····	90
史香崖终身不为官·····	92
乐亭王好问大义救海瑞·····	93
乐亭县杨扶青是党的好朋友·····	94
著名御医邸寿臣·····	96
乐亭也有个于成龙·····	99
爱国画家严柏年·····	100

第四单元 文化教育

李大钊故园兴学·····	102
苏林彦创办建国学院·····	103
武百祥故园兴学·····	104
“县立高”小记·····	105
热心办学的马益堂·····	108
呕心沥血育英才·····	110
书院春秋·····	112
颜李学派教育思想商述·····	115
乐亭庙会·····	118
饺子的来由(民俗)·····	119
爱国考古学家裴文中·····	120
谷应泰·····	121

河北的文房四宝	122
古钱年号趣事二则	123
河北秧歌	124
风靡一时的艺术形式——拉洋片	125
唐山水泥史话	126
乐亭北街王家胡同	127
“姚大吹”修车	128
惜阴歌	129
中秋节习俗	131
榆钱饭	132
春日话柳	133
鲤鱼羹的传说	134
源自滦河流域的成语典故	136

第一单元 伟人风范

孙中山的三位贤内助

孙中山一生有三位贤内助：就是原配夫人卢慕贞，“南洋婆”陈粹芬和革命伴侣宋庆龄。

原配夫人卢慕贞

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出生于1867年，其父卢显耀与孙中山兄孙眉都在檀香山经商。

1885年，18岁的卢慕贞依从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与孙中山缔结良缘。婚后，孙中山攻读于香港西医书院，只待寒暑假日夫妻团聚。1891年，卢慕贞生下孙科，第二年孙中山完成学业，先后于澳门、广州行医。

卢慕贞虽学识甚浅，但精于女工，且待人谦和，谨守“三从四德”。此时孙中山已投身革命，假借行医之机广泛交结志士。孙中山为革命一生奔走，或赴海外宣传，募集资金，以致屡遭清廷通缉，逃亡外洋，故治家、奉老、教子三责，只由卢慕贞一人承担。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海外。孙夫人带着婆母及幼子背井离乡，寄居中山之兄孙眉处，12年春秋，夫妻只团聚3次。后孙眉因全力资助革命而破产，孙夫人只好再次扶老携幼离开檀香山和孙兄回国，先居九龙，后去南洋槟榔屿。1910年夏，孙母去世，孙中山方回槟榔屿同夫人团圆。不到半年，殖民当局勒令其出境，夫妻再次离别。

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回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夫人才由南洋革命党人邓泽如护送携子回国。1912年2月下旬抵达南京，与孙中山聚首。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夫人又独自南返翠亨村家乡。孙夫人不惯风波，又无意政治，与中山婚后分多合少，加之孙中山淡于儿女情长，遂自感夫力协助丈夫事业，便几次劝中山另择佳妻，孙不应。“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夫人虑其飘泊在外，居食无人照料，恳切提出要孙纳妾，中山

未采。1913年宋庆龄任孙中山秘书，萌生了对其爱慕之情。孙中山与宋年龄悬殊，宋父母不同意他们相爱，加上自己又儿女满堂，且夫人数十载含辛茹苦呕尽心血，便不忍断然离妻与宋联姻。到1915年秋，宋庆龄不顾父母反对，向孙中山表达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孙中山便请夫人来日本征询意见。卢慕贞深明大义，从孙中山事业出发，毅然同意了“孙宋结合”，并欣然与孙中山办理了离婚手续。

卢慕贞回国后安居澳门，皈依基督教，扶养二女孙姃、孙婉，1952年病逝于澳门，终年87岁。

“南洋婆”陈粹芬

在孙中山家里，儿孙辈称宋庆龄为“上海婆”，称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为“澳门婆”，而另外有一位鲜为人知的陈粹芬女士则被称为“南洋婆”。

陈粹芬（1873—1960）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以排行称她“陈四姑”，福建省人，出生于香港（另一说系粤籍南洋华侨），并久居其地，身材适中，眉目清秀，但和当时的妇女一样，没有读过什么书。相传她于1892年8月12日在香港认识了孙中山，不久两人便陷入爱河，以后相携奔走革命，1893年，孙中山因行医高明，为同行所嫉妒，遂遭排挤，被迫由澳门返回广东，在广州开了一家“东西药局”。后来又偕21岁的陈粹芬与好友尹文楷医生同寓广州河南。由于孙中山奔走革命，陈粹芬寄避尹家达十余年之久。以后孙中山在英国蒙难，回国后为感谢陈粹芬对他的支持，将他的老师康德黎博士赠给他的一块大如小蟹的金表赠给了陈女士。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卓越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期间陈粹芬毅然加入革命行列，追随孙中山近14年之久，对外以夫妻名份掩护革命活动，对内则给孙中山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家中一切粗活如洗衣、做饭无不包下。当时蒋介石、戴季陶、廖仲恺都受到她的照顾与接待，俱称之为“四姑”。规模宏大的惠州之战前，用于起义的军械皆由海员公会的海员秘密运送，其中由日本、美国、朝鲜等邮船运来的最多。当时陈粹芬独当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每当横滨的邮船一到，她立即前往接船，革命

党人无不称赞她的勇敢。她却说：“我当时传递书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去做，总有办法。”1907年孙中山在广东边境四次起事，陈粹芬随侍左右。他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她也跟随服侍。

陈女士在清宣统年间患肺病，这在当时都认为是不治之症。她离开孙中山前往香港治病，然而此时的陈女士却不提当年勇而功成身退。她生活俭朴，留的是民初学生的发型，根本就不曾烫过发。1914年，她与商人陆文辉在南洋合开了一个橡胶园，孙科第一次出国考察前曾予以资助，孙科还请她回澳门居住。1932年孙科又亲自接她至老家卢公馆，与卢慕贞住在一起，并委托她照料儿子孙治平、孙治强兄弟。蒋介石南下广州也曾托居正带上三万元给陈粹芬。她与慕贞谊同姐妹，相处和谐，受到亲友们称颂。然而陈、卢始终未与宋庆龄有过任何接触。据孙中山侄孙孙满出示的香山孙氏家谱，所列中山先生配偶中，系以与之结合的时间及年龄顺序，将陈粹芬列在原配夫人卢慕贞之后，宋庆龄之前。

陈女士晚年身体甚好，据老革命党人刘成禺回忆，陈女士高龄75岁那年，还亲自做饭招待过他，并摄影留念。她享寿87岁，葬于香港九龙。陈女士跟随孙中山虽久，始终未育，收养一女，名孙仲英，与孙中山侄孙结婚，家庭美满，生有五男一女。

革命伴侣宋庆龄

宋庆龄，河南省文昌县人，她的父亲宋嘉树是孙中山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一生追随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负责为孙中山秘密印刷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两人关系密切。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二次革命失败，被迫逃亡日本。他的英文秘书宋霭龄由于要回国结婚，宋嘉树提出由宋庆龄把这个工作接过来。宋庆龄在与孙中山接触中，进一步了解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对他十分敬仰和爱戴，孙中山也从宋庆龄身上感受到振作和鼓舞，两人在配合默契的革命斗争中开始相爱了。

1915年孙中山与分居多年的妻子卢慕贞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宋庆龄主动提出与孙结婚。由于二人年龄相差27岁，宋的父亲又是孙的好友，于是孙中山便让宋庆龄回国先征求父母的意见。宋庆龄回到上海向父母亲一说，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宋嘉树说：

“这完全不可能，我和中山先生是朋友，是同辈，你是我的下辈！”宋庆龄的母亲一边哭一边反对说：“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他儿子孙科比你还大，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你不会快乐的，我决不同意！”连宋庆龄的姐姐、姐夫也一致反对，支持她的只有小妹宋美龄。

宋庆龄不为亲人的劝阻所动，坚定地说：“孙先生和他的事业需要我，我也需要他，我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才能获得快乐。”她的父母不但听不进去，还自作主张将她许配给上海的一位名门子弟。宋庆龄在这种情况下毅然离家出走，果断地乘船到达东京，回到孙先生的身边。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正式办理了结婚手续，并举行了简朴的茶点宴会，当时孙中山先生49岁，宋庆龄22岁。

宋老太、宋嘉树看到宋庆龄离家出走的告别信后，立即赶乘下一班轮船前往东京，苦口婆心地劝宋庆龄离开孙中山跟他们回上海。在老两口哭劝无效后宋嘉树甚至跑到日本政府去请求干预，说宋庆龄当时已22岁了，所以日本政府也无能为力，老两口也只好承认事实，伤心地回到上海。

孙、宋结合后，宋庆龄全力支持孙中山，照料孙中山，自己也正式投身于革命事业，成为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助手和伴侣，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他们的生活也是温馨幸福的。宋庆龄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我是幸福的，结婚对我来说，除了没有伤脑筋的考试以外，它好像上学校。”后来，宋庆龄的父亲终于接受了这桩既成事实的婚姻，她母亲还送给孙中山一些家具及被面、锦缎作为祝福的结婚礼物。

孙、宋结合10年后，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当时宋庆龄只有32岁。此后她一直独身生活，以对孙中山先生的真挚忠诚的爱情为感情支柱，继续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业，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国大典时，宋庆龄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孙中山两进唐山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生前十分关心唐山的工业建设，为了考察唐山的工业发展情况，曾于1894年夏和1912年夏两度来唐。

据《唐山市志》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国父偕陆皓东先生来唐，考察了唐山的工业”，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勾勒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蓝图。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并荣任临时大总统，从而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当年的3月21日，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之职。

孙中山辞职后，不忘振兴华夏大业之职责，于1912年夏偕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来唐，在唐山铁路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前身）向师生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平等自由的中国，一路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在座诸君不都投身于锋镝之向，况且学习采矿建桥，也是为了革命。”由此可知这位革命先驱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

为了发展海洋航运，孙中山先生在他所著《建国方略》中提出要建东方（宁波）、南方（湛江）、北方（乐亭）三大港口，后又派人到地处渤海湾的乐亭海边进行勘测，发现这里岸陡水深，是理想的港口所在地，并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在此建筑不封冻之深水大港”，宣告“顾吾人之理想，将欲于有限时期中发达此港，使与纽约等大”。

而今发达的唐山工业，雄伟的京唐大港，使孙中山先生两进唐山的遗愿梦想成真，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将永远记在唐山人的心中。

毛泽东与中国历史学家的交往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历史的研究，提出很多精辟的见解，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史为镜，解决很多革命实际问题。尤其是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团结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鼓励他们搞好历史研究，并给他们以具体的指导。诸如吴晗、冯友兰、范文澜、剪伯赞、吕振羽、陈垣等著名历史学家都曾受到他的熏陶和影响，从而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研究和发展。

毛泽东与吴晗

吴晗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在抗战时期，他曾在西南联大任教，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教授。

1948年秋，毛泽东同志在河北平山县接见了吴晗，并与之进行长时间交谈。他对吴晗所写的《朱元璋传》很感兴趣，于同年11月24日曾致信给吴晗称：“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跟吴晗交谈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藉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令人读起来不方便，世上流传亦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用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要搞一本详细的历史地图。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就向毛泽东推荐。毛泽东称赞了他的建议，并把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历代舆地图》的任务交吴晗办理。毛泽东还建议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对他写的《海瑞罢官》很赞赏。

毛泽东与冯友兰

冯友兰，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

1949年10月5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自己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表示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5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几天之后，他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中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好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曾请冯友兰吃午饭。1965年，冯友兰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开会期间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文革”开始，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赶出家门。直到1968年秋才算获得解放。冯友兰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处理呢？后来一个友人告诉他，毛泽东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提到他和翦伯赞，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的。我们只懂唯物主义，不懂唯心主义，如果要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毛泽东与范文澜

范文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较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史学家，因为受到毛泽东的器重。1940年范文澜带了30多籍书来到延安，经常就历史研究问题和毛泽东交谈。有一次，毛泽东希望他编写一本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历史读本。在范文澜的主持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中国通史简编》脱稿，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该书出版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1940年夏天，范文澜初去延安，曾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泽东闻知也去听讲。第三次因病未到，他给范文澜写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

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信中最后还说：“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在延安，毛泽东委托范文澜选编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之用。范文澜马上就与齐燕铭等人日夜加班，几个月之内就把《国文读本选注》编选出来了。毛泽东亲自为该书作序，特意提名表扬了范文澜。50年代，范文澜提出“厚今薄古”的历史研究观点，毛泽东闻知书，十分赞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文澜也是岌岌可危，随时有被揪出来的可能，但毛泽东保护了他。

毛泽东与剪伯赞

剪伯赞是维吾尔族，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

早在1939年，剪伯赞尚未与毛泽东见面时，他就在《群众、领袖与历史》一文中赞颂毛泽东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在重庆谈判时，剪伯赞在覃理鸣家里宴会上见到了他所颂扬的“伟大的历史人物”。

50年代，毛泽东读了剪伯赞写的一篇有关曹操的文章，对杯克等人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了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1957年3月13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剪伯赞。毛泽东问剪伯赞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剪伯赞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毛泽东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语为看，重理有道理。轻文就不对了。”剪伯赞回到北京大学提出并采取了加强文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建议和措施。

剪伯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批斗。1968年，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剪伯赞是讲帝王

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有了毛泽东这几句话，翦伯赞才被允许回家。

毛泽东与吕振羽

吕振羽是著名历史学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担任刘少奇的秘书。1942年12月，他随刘少奇到达延安，在当晚召开的欢迎会上，他第一次与毛泽东相见。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会见了吕振羽。当时吕振羽曾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在谈到这本书时，毛泽东说：“我读过这书，这应该是一部中国哲学史。”“为什么叫《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问。吕振羽回答说：“当时因为与陶希圣作斗争，为了针锋相对，所以用了陶希圣的书所用的名字。”“噢，原来如此。”毛泽东表示赞赏。吕振羽又说：“我打算将近代部分补写起来，还要写完《简明中国通史》，使这两部书成为从古到今、名符其实的完整历史。”毛泽东表示赞同。毛泽东比较注意吕振羽的历史研究著作。如他1959年10月外出视察工作时，曾点名要带一部分书阅读，其中就有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毛泽东与陈垣

陈垣曾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是我国著名史学家。1951年，陈垣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大会上作了《教师们要努力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发言。不料，在他发言以后，毛泽东竟走到他的席位旁说：“你今天发言，认识深刻，很有道理。”在这次会议最后一天宴会上，毛泽东与陈垣坐在一起谈了很久。当有些敬酒者向毛泽东问起他时，毛泽东总是愉快地介绍说：“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次年陈垣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革命先驱李大钊（1889 — 1927）

李大钊（1889 — 1927），字守常，乐亭县大黑坨村人。青年时代，“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以寻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为己任。1911年前后，积极参加北方的革命活动，猛烈坪击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军阀官僚政治。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留日期间，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称帝阴谋的文章闻名于世。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编辑《晨钟报》和《甲寅日刊》，后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并参与创办《每周评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1918年，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经济学教授。这时他毅然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首先揭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热烈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纪元”的到来，并立即向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强盗世界”展开了坚强不屈的斗争，从而成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之一。1920和1921年，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的共产党小组，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和各地共产党小组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1925年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受尽种种酷刑。4月28日，被杀害。